

文化特色：澳門的身份認同

鄭妙冰*

澳門地處南中國邊緣地區，在兩個政治實體和兩種獨特文化哺育中成長，擁有與眾不同的身份認同。社區建基於歷史文化，而身份認同的概念與社區意識息息相關，包含的不僅僅是個人意識（個人身份認同），更涵蓋了特定的文化“遺產”（文化身份認同）。一種集體的文化身份認同，所指的是“一群有共同經驗和文化象徵的人，對於延續性、共同回憶與命運的感受與價值標準”（史密夫，1990：179）。喬納森·弗里德曼有更概括的描述：“文化認同”屬於與生俱來無須學習無須爭取而歸人所有。廣而言之，是民族或生理遺傳的概念；狹義地說，是遺產或者是文化遺傳，明確地由每個人透過其個人行為代代相傳。也就是西方普遍的種族淵源概念。（弗里德曼，1994：29-30）弗里德曼的理論指出，文化認同或種族淵源是個人擁有的，是某種社會認同的基礎。因此個人認同不僅依賴於社會，還幾乎全由社會環境界定。透過由自我和傳統結合而成的社區意識，個人意識才得以顯現。澳門這個半島城市充滿了葡國氣氛格調和中國文化特徵，而且到處可見陸上、海上以及城中的風光。這裡蘊涵的“意義和價值觀念”令澳門的文化更形多樣化和複雜化，並促進了其身份認同的形成。複雜多樣的文化傳統亦必然地構成了集體身份認同，當中又包含狹歷史環境和文化特徵兩部分。

自從1557年葡國於澳門實行一種殖民帝王式統治，將其價值觀和宗教信仰強加於中國政治社會架構之上。隨狹架構的轉變，文化基礎亦由於內部演進或政治革新而變更。澳門的“生活方式”與一系列的關係相互交錯，這些關係具有於時空中可變亦不斷轉變的特質。其與外界社會的多元聯繫，有力地顯現了文化變遷的可滲透性和流動性，在殖民管治中變成複雜而可對話的。今天，澳門這個“聖城”的基督教堂和中國廟宇林立，但又不乏不拘一格的遺址和雕像，賭場與風月場所更不在話下。這種對立的情景構成了“兩面神”（Janus）⁽¹⁾的形象，與社會組織和文化習俗不盡偕合。

宗教寶島

1576年，在澳門教區正式建立後不久，澳門就被冠以“天主聖名之城”的稱號。與此同時，澳門建造教堂和小禮拜堂的數目按面積比例勝於其它國家，被稱為“基督之城”及“聖城”。其傳揚宗教信仰的熱忱又帶來了“東方基督教國家領袖”、“遠東羅馬”和“亞洲傳教之母”的美譽。

同時，澳門大部分教堂都以聖母瑪麗亞為外表裝飾，“聖母瑪麗亞之城”因而得名。值得一提的是，聖母瑪麗亞身為“耶穌基督之母”的地位要到12-13世

紀那個充滿宗教熱忱的年代才得以廣泛認定。中世紀神學家對於無玷成胎之說意見分歧。修士教團當中，多明我會修士否定這個說法，但是方濟各會修士就予以認同。到了17世紀，無玷成胎之說在耶穌會的促成下站穩了腳。1640年建成的耶穌基督之母教堂遺址，即大三巴，是耶穌會頌揚這說法的最好見證。⁽²⁾澳門因此成為了一個宗教堡壘，為鞏固這個突顯而為眾所公認的說法提供了立足點，以利於耶穌會提倡對聖母瑪麗亞的崇拜。

澳門在天主教義與新教教義之形成扮演了橋頭堡角色，成為西方基督教教義再調整中的“東方階

* 鄭妙冰，香港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著有《澳門：文化的兩面體》（1999），在港澳發表不少論文。本文為作者出席2002年9月10-13日在澳門召開的“城市文化遺產的保護：澳門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講演稿（中譯本）。

段”。16世紀反宗教改革和18世紀工業革命這兩次決定性的改革餘波，構成了基督教於東方傳揚的隱性動力。這兩次改革其後對澳門有深遠影響。澳門因而成為代表基督教兩種傳道方式的“兩面神”：一面是天主教，另一面是新教。這兩種方式分別由葡萄牙和英國這兩個海上霸權所扶持。

一般認為，葡萄牙是歐洲最虔誠的天主教國家，天主教教義對於其思想和政治體系起著重要影響。雖然秉承了猶太教與基督教所共有的改變信仰的傳統，葡萄牙人依然未能取代澳門佛教與道教並存的信仰。澳門一直是一個多元跨宗教信仰並存的宗教城市。澳門擁有八十座中國廟宇⁽³⁾，到處浸透本土宗教文化的特有氣氛。佛教與道教並存這種多元現象，令各階層人士可以參予不同宗教體驗和禮拜儀式的傳統。澳門的廟宇似乎沒有不變的派別規條，或分辨兩種不同的宗教情感。中國人顯然提倡泛神論，這體現於宗教的包容、妥協和融合。

由明代（1368-1644）開始，融合⁽⁴⁾和容許不同信仰一直都是中國宗教生活的中心部分。當時三教合一是由三一教教主林兆恩（1517-1598）熱心推動的。宗教融合因而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忠於某一思想體系或宗教，於中國人社會並不普遍，澳門大部分中國人基於這種融合的信念，會因應不同情況需要到廟宇求神庇佑，而不是忠於某個固定的教會。

在澳門，基督教堂內的小禮拜堂和壁龕放置聖像，而佛道廟宇不理會宗教和教義的分歧，把所有廣為流傳的神都置於神龕內，很顯然就是相互影響的結果。天主教遵循中心教會的原則，禁止任何異教的信仰。相對來說，中國宗教體系發展出容許不同信仰和儀式的宗教基礎，互為補足。事實上，一些宗教上的相似之處往往被視為分歧，天后和觀音就是一例。天后是道教掌管大海的女神，而觀音就是佛教代表仁慈的女神。中國人不加選擇地容許不同宗教派別的神或女神並存，以便自己可因應愛好或要求選擇和採用最適合的神靈。在澳門，各種各樣的教堂與廟宇和諧並存，這正好解釋了各宗教權力關係的平衡、某種微妙的宗教妥協以及不同信仰間的不尋常的寬容。這正是澳門的獨特之處；來自不同階層不同種族的信徒極少發生衝突，相反地以極大的寬容相互適應彼此溝通。

如果教堂是葡萄牙傳播基督教義這種西方正統學

識的標記，那麼中國廟宇就是有型的記號，代表中國政府利用“神話式標記”的綜合體，促成文化統一。具體地說，澳門有三個受歡迎的女神，聖母瑪利亞、天后和觀音，形成一個鐵三角組合，構成東西合一的“教化”力量，她們的影響力不相伯仲。澳門有“聖母瑪利亞之城”⁽⁵⁾美稱，同樣亦可被封為“天后之城”或“觀音之城”。這三位貞潔女神形成的鐵三角，控制澳門的宗教文化⁽⁶⁾，令其它男神相形失色，於澳門中葡兩種文化社會化和標準化的爭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教化和薰陶兩族人民的過程中佔據了“神聖地位”。

神聖的鐵三角將宗教思想體系中的同情和寬容人格化。崇高的宗教思想令中葡兩族人民可以容許相互的文化融合。獨有的“三位一體”關係，“相互交織”的性質，以及互為補足的特點，使澳門各族社群無禁忌地接受對方的信仰。這些特殊的宗教經歷最終聯合為共同的傳統。

澳門贊頌宗教包容和文化融合，不同宗教信仰，包括天主教、新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⁷⁾及巴哈伊教⁽⁸⁾共存於澳門，不單顯示了不同信仰系統中的文化融合和宗教妥協，還證明了東西方宗教實踐的並存。澳門是一個奇異的令人不可思議的宗教傳揚及互相包容的接合點，無疑已成為獨一無二的、可容納不同信仰的宗教寶島。

“不中不西”

澳門葡萄牙政府於1984年6月通過了〈建築、景色及文化財產的保護法令〉，目的是要保護澳門的歷史、文化和建築遺產，作為旅遊財產。自此文物保護成為重要的議題，一絲不苟的修復和大規模的保護工作得到熱情和廣泛的支持。對文化遺產的重視有助於集體身份認同有系統的確立與改良。

葡方為了於離開澳門之前塑造一個仁慈的“殖民者”形象，想出了自我粉飾的策略。1993年至1999年是澳門紀念相互理解、合作和友誼的時期，一共有十三座友好紀念物建成⁽⁹⁾，為兩國友誼和兩國人民的和諧共處作留念。這些耗費鉅資的工程一度引起民間社團的責罵，關注教育、社會服務以及房屋政策的社團認為工程流於表面化而且浪費。從藝術角度看，友誼紀念碑和雕塑蘊含著豐富的社會、文化及政治特色，同時說明了東西方對符號和象徵理解的“分歧”。這

些工程一方面為葡萄牙駐足亞洲的最後七年添上榮耀，另一方面成為了澳門文化遺產的一部分。這個小城裡的公園、廣場、主要道路和填海地都有新的標誌，堪稱為紀念碑和雕塑之城。

在結束殖民統治前，英國挾眼於香港的經濟冒險，而澳門的葡萄牙人就關注保留文化遺產。澳門被修飾為一個富有西方魅力的獨特城市，這種輝煌風貌是亞洲各前殖民地都不容易找到的。新建的友誼紀念物顯示殖民恩澤的勝利，葡萄牙人成為文化的施主，驅除了後殖民時期的成見；又可以被視為後殖民時尚的預演，預祝殖民篇章的結束。更明確地說，友誼紀念物有助於確立澳門於後殖民年代的身份認同。

眾多紀念物當中，最能表現跨文化混合身份的，除了1999年揭幕的觀音像外別無他選。觀音像由葡萄牙建築及雕塑家李潔蓮設計，銅像座落於文化中心附近外港的人工小島上。二十米高的觀音像，看來更像一位苦行修女，以頭巾覆頂，身穿樸素衣衫，與1998年落成的天后雕像比較不甚相同。天后像大型堅固，佩帶珠寶，身穿莊嚴服飾。觀音像身體微傾而苗條，像英文字母S型的形態看似歐洲雕塑的造型。雙手包裹於衣服中，沒有握挾任何東西。“大膽”地忽略了一些傳統的同時，祇忠於傳統造像的一個特徵，就是置於前額中央的記號所代表的精神智慧的第三隻眼睛，設計意念極富創意，嫁接東西方的元素，形成文化的融合體。

閃爍的金銅像聳立於七米高的底座上，連接挾一條八十一米長的走廊。兩層高的底座以蓮花作造型。整座建築物名為“觀音蓮花苑”，以研習東方宗教和哲學為主要任務，闡明中國儒佛道三大學說，並推出文化活動。澳門新聞局形容該中心以促進各民族和文明之間的互相尊重和友誼為宗旨，反映宗教包容和澳門多個世紀以來的典型多元文化環境。再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贊揚其計劃具文化意義，為來自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社群提供溝通的空間，分享共同的價值觀。

但也有人毫不客氣地批評雕像不中不西（見於〈不中不西〉，澳門日報，1999年12月31日）。市民亦傾向於認為造型“西化”，有些人更指雕像與西方的聖母瑪利亞相似，不像中國女神。可是，本人抱歉地也要表明一下與這些評論不同的意見，那就是“不中不西”的外貌正好說明了澳門文化混雜的東西文化

的跨時空融合的特質。

本土混血兒

澳門是個華洋雜處的地方⁽¹⁰⁾，發展出獨有的自我本位與身份認同。雖然葡萄牙人為達至融合及不彼此表現出不懈的努力，但泛種族的理念最終祇投射出混雜後代的幻象，成為殖民地遺產的一面。不同文化匯聚與葡萄牙容許雜婚，產生了一批“新冒出的”少數民族。這群混血的葡萄牙人就是土生社群。⁽¹¹⁾這些歐亞裔人生活在一個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交界面，巴巴（殖民學者）稱之為“第三空間”。這個混合階層又構成了殖民問題討論中另一層次的身份認同，巴巴用“白，又不盡然”來形容。⁽¹²⁾

在跨種族交往中，歐亞裔曾被看作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可悲的融合，是西方男性的掠奪和東方女性性的屈服，並非兩種文化值得自豪的混合。在越南，歐亞裔孩子有bui doi這個含貶義的稱號，意即“生命的塵埃”。土生葡人外貌介乎兩者之間，兩者兼有的容貌與文化特徵相互交錯往往引起中國人和“純”葡萄牙人的歧視和咒罵。據賈淵觀察所得，這種種族歧視在土生社群中構成了緊張氣氛，引起自我身份的矛盾。漸漸地一種“自我分割”發展成為新的社會分化，一個細小而相對封閉的土生社群成為社會的特色。（賈淵1994：121-122）

由於土生葡人的“交界”特性，1999年政治轉型令他們感覺疏離、無根、迷惘且受壓，使其捲入身份危機當中。前此一個名叫“根在澳門”的社團於1996年成立，宗旨是強調他們在澳門扎“根”，營造歸屬感。這個組織很大程度上協調舒緩他們的不安。身處於以中國人為主的社會裡，他們的本位和身份認同得以強化，而最重要的是反映了他們雖輕微卻存在的族群力量。

1999年豎立的友誼紀念物中有一尊紀念近代土生詩人作家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 (1919-1993) 的銅像。在土生社群中Santos Ferreira被稱為“阿德”⁽¹³⁾，是土生葡人眼中的族群英雄，也是葡萄牙、澳門和香港之間的文化紐帶。銅像位於友誼大馬路一個新建公園藝苑的當眼處，它或許可算是遲來的“土生建築物”。

多年的混雜令土生葡人發展起自成一格的生活藝術，包括一種獨特的烹調風格，稱為澳門菜。⁽¹⁴⁾澳門菜主要由果阿及馬六甲風味組成，加上一點點的中

國口味。澳門菜兼收並蓄的烹調材料，反映出多元種族和地理源頭，代表殊一種本土的烹飪文化。安·戈德曼（Anne Goldman）指出“特定菜餚蘊含的祈願，代表文化民族主義說話……烹調技巧的改進也可以使種族議題系統化。”（戈德曼，1992：173）。透過澳門菜，土生葡人將種族特徵變成密碼，利用菜餚取得的文化認同，令變遷中的“文明”與葡萄牙、果阿、馬六甲、非洲和中國的烹飪混合取得平衡。

澳門菜體現了烹調與文化認同的關係，堪稱不同文化融合的典範。菜餚不單是一種獨特的文化形式，還產生文化實踐與價值，土生葡人賴以生存，亦得到自我肯定。澳門菜介乎兩種菜餚之間，轉喻文化領域中的混合種族身份認同和自我聲明。與此同時，亦反映混合連續的內部過程，無疑是“界線踰越”的例子，顯現不同烹調專長的美味混合。澳門菜於中港澳地區的流行完全說明了文化界線的流動性。雖然種族界線在其它方面實質上還很明顯，澳門菜充當族調停的角色，在某程度上舒緩了種族緊張和敵視情緒。

澳門食品和菜餚在不同地方仍不失其對食客的吸引力。澳門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美食之都。香港雖然亦繼承了一些英國殖民者的“遺產”（例如“奶茶”），澳門食品卻以其突出的文化創造及形成一種特別“菜餚”的特點，遠超過了香港於其一百五十年殖民歷史中留下的混雜飲食文化。飲食文化的重要性也許有助於我們“重新考量”葡萄牙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是否必然造成欺壓和被欺壓者的特定霸權模式？

活躍的旅遊名城

香港2001年被冠以動感之都的美譽，澳門亦由於大力推廣旅遊而獲得了文化名城的稱號。新的名稱意在消除澳門在文明邊緣所有負面的殖民形象。為了吸引更多遊客，澳門興建了多間博物館。在細心安排規劃下，澳門成為博物館之城，亦展現了現代中國多元文化。再者，澳門又提供受歡迎的展覽場地，每年均有精彩的盛事舉行，因此又多了盛事之都和慶典之都的稱號。就在慶祝澳門回歸中國兩週年之際，澳門旅遊塔會展娛樂中心於2001年12月落成啟用。與1993年建成、缺乏實用功能、人們不能攀上頂端看風景的融和門不同，高338米高度位列世界第十的旅遊塔⁽¹⁵⁾，設有旋轉平臺層可眺望南海。這個紀念工程當然地成

為熱門的旅遊點。

2002年澳門為博彩專營劃上句號，由賭王何鴻燊擁有的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不再獨佔鰲頭⁽¹⁶⁾，政府重新發出牌照給三間賭業公司。此舉不但改革賭業本身，更重要是肯定這個主要行業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地位。其中一個投得者是何鴻燊新成立的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其餘兩個對手是美國澳門合資的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港澳合資的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在不久將來澳門會因增加的賭場而變得更豐富多姿。

這個賭博天堂曾一度處於槍林彈雨之下，就在歷史性交接前得到了“東方芝加哥”的綽號。在西方人眼中曾經被形容為1999年後的“脆弱都市”或“迷失之城”〔波特（Porter）1996：3，193〕。幸好澳門能夠採取實際措施維持繁榮穩定，執行法治，才證實這些評論都是輕率及過於悲觀的。

澳門這個“聖城”亦像其它城市一樣，娛樂和墮落並存。澳門從一個天主教區變成為亞洲出名的賭城好不具有諷刺意味。雖然曾經被稱為“東方梵蒂岡”和“遠東羅馬”，蓬勃的賭業亦帶來“遠東拉斯維加斯”及“東方蒙地卡羅”的稱譽。澳門更以擁有比蒙地卡羅更多的賭桌，比梵蒂岡有更多的教堂而引為驕傲。教堂與賭場的對峙並列是黑白並存的諷喻。W.H. 奧登（W.H. Auden）在他題為“澳門”的詩中尖銳地捕捉了這種矛盾的景象。他說，在這“沉溺的都市”沒甚麼重要的事情發生：

洛可可式聖人和基督像

死後為賭徒們帶來幸運；

妓院旁的教堂向上帝懺悔

虔誠令本能行為獲得寬恕

（奧登，1958：59）

在澳門，尊貴的聖人可找到樂土，萬惡不赦的壞蛋也有藏身之所。澳門是崇高與庸俗的混合物。第三個千年伊始，澳門成為無法抵擋的旅遊勝地。賭業與旅遊業並肩前進，令澳門成為南中國一個會議、娛樂和博彩中心。

結語

在這彈丸之地，教堂及廟宇簡潔並立，成為不同

尋常的抽象拼貼建築畫，證明“有宗教信仰者”（天主教徒）及“無宗教信仰者”（中國人）之間的宗教包容。這些宗教界標培養兩族人民之間的文化結合，既防止群體的分崩離析，也避免了個人“漫無目的”的感覺。宗教生活令種族凝聚力加強，集體身份得以建立。臨近第三個千年的開端，澳門也許可以充當模範，為每日都有具破壞性的宗教衝突和種族鬥爭的地方作個榜樣。

如果教堂可令澳門有葡萄牙的“外觀”，廟宇無疑也可作為中國文化的“門面建築”。可是，教堂更多地獲得良好的保護，給人一種寧靜聖潔的氣氛，而廟宇則既污穢又擠滿乞丐以及討“香油”錢的人，媽閣廟恰恰就是這樣。在眾多文化標誌中，中國人引以為傲的這間廟宇，原因是他們相信媽閣廟預見葡萄牙航海家的到來。葡萄牙人登陸時首次用亞媽港（A-Ma-Gau）來為“澳門”命名，由A-Ma-Gau變為“Amacao”或“Amagao”，再到後來的“Macao”。可惜整座廟宇明顯欠缺適當管理，花園經常有鞭炮的碎屑，有些地方更佈滿垃圾。媽閣廟不經意地成為東方主題講演中一成不變的論點，那就是混亂、不理性及迷信。簡單地說，這種宗教地方的喧囂，雖不至於可怕，卻徹底地褻瀆了神明。或許，淨化中國廟宇的形象和令廟宇成為舒適的旅遊點，該是澳門的一項文化任務。

在殖民的層面中，中葡文化包括了融合和分歧，但彼此從未能征服對方。澳門作為亞洲歷史最悠久的殖民城市，說明不同種族是可以妥協的，可致力促成一種由互不相容卻各不相干的社會規範所組成的文化力量。澳門是個混雜族中葡影響的地方，擁抱族兩面的宗教文化：猶太基督及佛道信仰。這就是澳門獨特之處，反映疊合的“生活方式”，保留本土的“意義與價值”，有各種各樣的文化表現。兩種文化有其對話方式勝過祇偏重於文化特徵的單一面。重要的是，兩族人民的對話促進了澳門混雜格式的發展，從中冒起了一群歐亞裔人。這個“中間”階層創出了一種烹飪文化，有助於確認他們自然而生的族群身份。這個地方現有及過往一直擁有的特點，就是文化具有交替的雙面，包含族中葡兩方面的遺產。基於此，澳門的身份認同得以建立，過去和現在的結合透過文化遺產得以加強，從而鞏固集體文化的身份認同。

【註】

- (1) Janus是古羅馬時期的神，掌管出入口和城門。他的造像通常是有兩面的，雙臉面向相反的方向，暗示族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
- (2) 耶穌基督之母教堂遺址常被誤以為是紀念聖母昇天的。而有關遺址上代表無玷成胎信條的標記，參見本文作者的著作：《澳門：文化的兩面體》，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83-100；
- (3) 根據文化局文化財產廳，這個數字不包括街上或住宅門前的神壇和壁龕。
- (4) “syncretism”這個詞來自一歷史事件，當時克里特島（希臘領土）上的居民克服了內部鬥爭，聯合起來對抗敵人（見《宗教和種族百科》），因此，這詞指對立的宗教信仰或原則的調解或融合。
- (5) 聖母瑪麗亞亦和天后觀音一樣，與大海關係密切，由聖安博（聖人）開始有無數信奉基督的作者都稱聖母瑪麗亞為“海之星”。
- (6) 有關三個受歡迎女神如何主導澳門的宗教文化，參見本文作者的著作：《澳門：文化的兩面體》，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四章“三女神的會合點”。
- (7) 雖然澳門的伊斯蘭教成員祇有500人，他們也組織了澳門伊斯蘭教會，還計劃興建一座耗資三千萬港元的清真寺。載於《南華早報》2000年9月2日。《Visão de Macau》
- (8) 巴哈伊教是19世紀中由波斯預言家巴哈歐拉創立的，信徒奉祂為第九位上帝使者，之前有佛祖、耶穌……等共八位。在澳門巴哈伊教有大約兩千名信徒，他們創辦了聯合國學校，它雖然不是教會學校，卻是澳門唯一的國際學校。載於《南華早報》2000年11月11日。
- (9) 有關十三座友誼紀念物，參見本文作者的專題文章〈澳門：友誼的建立〉，載《神州展望》，2001年3/4月，第34期。
- (10) 德勒茲（法國哲學家）所說的“subjectivity”指的是自我本位的問題，以身體作為符號，內層經外層自我卷曲得以顯現。
- (11) 一些土生葡人基於本身澳門出生，而且出於葡萄牙門第的事實，自稱為“純澳門人”。他們又稱自己為“大地之子”，暗指沒有根的階層；而廣東人則稱他們為土生仔，即本地出生者。有關資料，參見安娜·瑪里亞·阿馬羅的作品《大地之子》，澳門文化司署1993年；以及《文化雜誌》葡文版1994年20期；以及賈淵的《颶風之鄉：澳門土生族群動態》，澳門文化司署1993年。
- (12) 可參考巴巴的文章〈模倣與人：殖民論述的含混〉，1984年10月28冊。
- (13) 有關阿德的圖片傳記，參見馬若龍的《阿德：圖片集》，澳門基金會1994年。
- (14) 獨一無二的澳門菜有由不同肉類煮成的雞燴，以及由豬肉和杏仁烹煮的Capella，見R.A.澤普：〈中葡文化的交流〉，載R.D.克里默：《澳門：文化商業之都》，香港API出版社1991年，頁157；亦見安娜貝拉·多林：《澳門的食物：烹調之旅》，香港圓屋出版社（亞洲）1994年。
- (15) 世界上最高的是位於加拿大多倫多的CN塔，高度有553米。
- (16) 公司1962年獲發賭博專營牌照，是澳門勞動市場的一大僱主，聘用超過11000名員工。

李露明譯



“城市文化遺產的保護：澳門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嘉賓遊覽澳門名勝古蹟媽閣廟合照